



时空与人事交错

——读施展《河山》有感



庄启龙/文

翻开《河山》，迎面而来的不是常规的朝代更迭时间轴，而是打开地图，重新打量脚下的这片土地，看山脉走向、水系分布、气候变迁。施展用“地理”这把手术刀，剖开了中国历史最深处的肌理。相比他之前的《枢纽》《溢出》等作品，《河山》提供的“地理+故事”的核心架构极为清晰：地理提供历史的底层条件，故事赋予这些条件意义。二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解释框架。这个框架确有洞见。

《河山》最大的贡献，在于打破了“中原中心主义”的叙事惯性。长期以来，很多历史书写习惯于从中原出发，把周边视为蛮夷或边缘。但是，施展把草原、西域、高原、海疆拉到与中原同等重要的位置。在他的叙述中，中原不是唯一的发动机，而是整个复合生态区的一部分。这种视角转换的意义，不亚于哥白尼式的革命。

施展提出的“异质性碰撞”概念值得重视。同质人群之间的冲突往往是简单循环——谁赢了都一样，换个姓氏继续老路。而异质性人群之间的碰撞，则会催生全新政治形态和社会结构。北魏的“均田制”、唐代的“两税法”、明清的边疆治理，无不是在应对不同生境的挑战中诞生的。这一点在河西走廊的论述中最为精彩。施展指出，河西走廊不仅是地理通道，更是文明意义上的“熔炉”。农耕、游牧、绿洲商贸三种生境在此交汇，催生了敦煌这样的文化奇观，也锻造了隋唐帝国开放包容的气质。没有这种异质性的碰撞，中国可能只是一个偏安一隅的农耕政权，而非横跨欧亚的庞大文明体。

他对“故事容量”的论述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一个文明能容纳多少异质性，取决于它的故事有多大。罗马帝国的故事容纳不了基督教，最终分裂；中国的故事却能不断扩容，把佛教、伊斯兰教乃至西方思想都消化吸收。这

种“扩容”能力，正是中国文明延续性的秘密所在。

讨论之外，质疑同样必要。施展反复强调他不是地理决定论者，可全书的结构性论述，难免让人产生“地理框定一切”的印象。比如，他论述太行山两侧差异如何塑造周秦与六国对立，逻辑链条固然严密，但我不禁要问：同样的山脉，为什么在不同朝代产生了不同的政治后果？如果地理真的如此关键，处在同一地理单元内的政权是否就该走上相似道路？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这就涉及拉铁摩尔的“贮存地”理论。这位美国学者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指出，长城沿线是游牧与农耕的过渡地带，双方在此形成复杂的共生关系。拉铁摩尔的论述同样重视地理，但他强调的是人的选择和策略——牧民可选择南下劫掠，也可选择贸易；农民可选择筑城防御，也可选择移民实边。地理提供了可能性，最终决定权在人。相比之下，施展的论述似乎更倾向于“地理推动历史”，而非“人在地理中创造历史”。

葛剑雄先生的观点也值得对照。他曾深入探讨地理环境与中国历史的关系，但始终强调地理环境的作用是“影响”而非“决定”。他举过徽商和晋商的例子：徽州和山西同样面临山多地少、耕地不足的困境，但为什么偏偏发展出独特的商业文化，而同样环境的湖南西部却走上了不同道路？这说明，在地理这个既定舞台上，人的选择、文化传统、偶然事件依然拥有巨大话语权。

这又让我想到了王汎森先生提出的“执拗的低音”，提醒我们关注那些被宏大叙事过滤掉的不合主流的细节。读《河山》时，我常想起这句话。书中整齐划一的逻辑线条，会不会掩盖了历史的偶然性和碎片化？蒙古征服中原的过程，究竟是地理逻辑的必然结果，还是一系列军事天才和运气叠加的产物？施展给出的答案是前者，但这个答案恐怕无法说服我。

这又让我联想到埃德蒙·伯克在《法国革命论》中的告诫：任何试图用一套抽象理论彻底解释复杂现实的企图，都应保持谦逊。历史充满不可预测的变量，绝非某种单一逻辑所能穷尽。伯克作为现代保守主义的奠基人，对那种仅凭抽象理性试图从一张白纸设计出完美社会的激进做法深恶痛绝。当下的决策者不可能掌握全部信息，也不可能预见所有后果，绝不能以一种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去规划一切。

然而，《河山》的理论体系太过完整，以至于给人一种“历史本该如此”的结构化错觉。但历史从来不是“本该如此”的，它充满岔路和意外。如果汉武帝没有派张骞出使西域，如果唐太宗没有击败东突厥，如果忽必烈没有选择定都北京……这些偶然事件，任何一个发生变化，都会改变中国历史的走向。地理也许设定了边界，但在这个边界之内，人的选择才是真正的驱动力。

综合来看，《河山》的价值不在于给出终极答案，而在于打开一个新的思考维度。它让我们意识到，中国历史不能只在时间线上打转，还必须放在空间中审视。山河是骨架，故事是血肉，但历史还需要第三个要素——灵魂。那个灵魂，就是一代代人的选择、挣扎和创造。

读《河山》，最好的态度不是全盘接受，也不是一味否定，而是把它当作一面镜子，用它照见我们习以为常的历史叙事中那些被忽视的空间维度，同时照见它自身的局限。正如施展所说，中国需要更大的“故事容量”来容纳自身的复杂性。《河山》本身，就是这个扩容过程中的一次重要尝试。尽管我无法完全认同它的每一个结论，但我愿意承认，这是一本值得认真对待的书，因为它提出的问题，远比它给出的答案更重要。读《河山》，如同同时观看一张地图和一幕戏剧。时空是舞台，人事是演员。舞台限制了演出的边界，但剧本怎么写、戏怎么唱，终究还是人的事。

沙与沫之间

——读纪伯伦《沙与沫》

点点/文

纪伯伦在《沙与沫》的开篇写下一段话：“我永远漫步在这些海岸上，在细沙和泡沫之间。高涨的潮水抹去我的足迹，海风也将泡沫拂去，但是，海与岸将永恒。”

《沙与沫》是纪伯伦用英语写成的散文诗集，全书三百多首短诗，长的不过十几句，短的只有一行。纪伯伦没有嗟叹生命的短暂，而是以坦然从容的姿态，确认了永恒之物的存在。书名的深意正在于此：沙与沫终将逝去，但海洋和沙岸永远存在。

读《沙与沫》，像在海边捡石子，每一颗拎起来没几两，放进口袋却沉甸甸的。它是一捧散落的珍珠，随手拾起一颗，都能照见一点光亮。

纪伯伦笔下，最动人的是他对“自我”的审视。那首广为流传的《我曾七次鄙视自己的灵魂》，以七次排比剖开人性的软弱：想高升时故作谦卑，在糗事面前跛行，在难觅之间选择了容易……读者读到的不是训诫，而是一面镜子。还有一句更短的：“我和另外一个我，从来没有完全一致过。”一个人身上住着两个“我”，一个在光明中睡着，一个在黑暗里醒着，这种内在的撕扯，谁没有经历过？

关于记忆与遗忘，他写：“记忆是相会的一种形式，忘记是自由的一种形式。”记忆让逝去的人重新来到我们面前，而遗忘让沉重的过去得以松开手。短短两句，把两种看似对立的状态，都变成了礼物。

关于苦难与黎明，他说：“除了通过黑夜的道路，人不可能通向黎明。”没有捷径，没有绕行，你想要光明，必须先穿越黑夜。这话朴素得像一句俚语，却让无数困顿中的人反复咀嚼。

关于诗本身，他的定义最为精妙：“诗不是一种表白出来的意见。它是从一个伤口或是一个笑口涌出的一首歌曲。”诗不是道理，不是观点，不是精心雕琢的修辞，它是人活着活着，从身体里自然淌出来的东西，高兴了淌出来，疼了也淌出来。这个定义，把无数关于诗的讨论，一句说尽了。

纪伯伦还有一处极妙的笔法。有人对他说道：“你和你生活的那个世界，不过是无际大海边上的无尽沙滩的一粒沙子。”他在梦中回答：“我就是无垠的大海。大千世界不过是我岸边的几粒沙子。”一粒沙可以渺小到被风吹走，也可以广大到容纳整个世界。卑微与尊严，竟可以同时成立。

《沙与沫》常与泰戈尔的《飞鸟集》并论。两者都以短章见长，但气质不同：《飞鸟集》灵动飘逸，关注一花一草；《沙与沫》端庄大气，目光更远。“对于从银河的窗户外下望的人，空间就不是地球与太阳之间的空间了。”

三百多粒“沙”、三百多朵“沫”，随手翻开一页，都可能被某句话轻轻击中。纪伯伦早已离开这个世界，但他的文字还在那里。读《沙与沫》不需要一口气读完，每天读一两页，像每天捡一两颗石子。今天读到的一句，也许当时只是轻轻掠过；一星期后，它会在某个深夜忽然把你叫醒。

合上书，“沙与沫”这三个字还在眼前晃。脚印会被抹去，泡沫会被吹散，但灵魂的清醒与温柔，终将沉淀成属于自己的永恒。

懂生活也幽默的康德

——读古留加《康德传》

允博/文

说到康德，你会想到什么？

是那个一辈子没离开过哥尼斯堡的刻板老头，还是三大批判里晦涩到让人望而却步的哲学大佬，还是每天下午3点准时散步、邻居用来对钟表的“人肉时钟”？

很多人觉得，康德的世界里只有抽象思辨，单调又枯燥。但古留加的《康德传》，打破了这份刻板印象——它让我们看见一个有温度、懂生活、会幽默的康德，读懂他“单调”人生里，藏着的顶级清醒与力量。

他的人生，用一句话概括：生于哥尼斯堡，长于哥尼斯堡，死于哥尼斯堡。他终身未婚，凌晨4点起床，写作、授课、吃午餐、散步、晚间阅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在外人看来，这是枯燥。古留加却说，这是极致的自我掌控。康德自幼体弱，被断言难以长寿，却凭借自律的生活活了80岁，一生几乎无病。他

说：“若不支配自己的天性，必被天性支配。”

这份自律，不是压抑，而是清醒——他把所有世俗欲望，都转换成了对精神的追寻。但他并非古板，其实，他格外擅长社交，风趣又健谈。

他说：“一个人吃饭，头脑得不到休息，只会消耗精力；与人共餐，自由交谈，才是真正的放松。”餐桌上的他，是全场焦点，天文地理、文学艺术、市井趣事，无所不谈，还总能讲讲幽默段子，让宾客尽兴而归。

他的朋友曾说：“只靠著作和讲义认识康德，你只认识半个他；只有在交谈中，他才会完全吐露衷曲。”原来，这位在书斋里构建哲学体系的思想家，也食人间烟火、爱热闹，是一个内心丰富的普通人。

说到他的哲学，总绕不开“三大批判”。古留加用通俗的笔触，讲透了这三部著作的核心——康德尽其一生，回答三个终极问题。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要解决“我能知道什么”这个问题，我们能认识现象世界，却

无法触及物自体本身。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要解决“我应该做什么”这个问题，确立道德的准则，自律即自由，真正的道德是发自内心的敬畏与坚守。在《判断力批判》中，他要解决“我可以期待什么”这个问题，他认为审美让我们在自然与自由之间找到平衡，看见永恒的希望。古留加说，康德的哲学体系，归根结底是“真善美”的统一——求真、向善、爱美。这也是人一生的终极追求，康德在身体力行。

读完这本小书，我才发现：康德不是活在云端的哲人，而是一个把哲学活进了日常生活的普通人。他的一生看似单调，实则饱满——因为他用自律换来了自由，用理性照亮了生活。这本小书，没有晦涩的哲学术语，没有冗长的理论堆砌，只有平实的文字、鲜活的细节、深刻的洞察，一如古留加撰写的其他传记，比如关于黑格尔、谢林的。

卢克莱修说：“我这里只要稍加指点，你就可以猜到全部秘密。”这是康德喜欢的一条箴言。

爱在花园里

——读茨维塔耶娃

沈文军/文

第一次读到茨维塔耶娃的《我想和你一起生活》，那种安静又滚烫的爱意，让我觉得她不是在写诗，而是在种一座花园。

首先是亲人的爱。茨维塔耶娃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彼得堡学院通讯院士，著名艺术家，一生致力于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的创建。母亲是音乐家，弹得一手好琴，并精通几种欧洲语言。她在《致妈妈》中，是这样写的：“在陈旧的施特劳斯舞曲中，/我们首次听见你轻声呼唤。/自那时我们便疏远世界，/爱听钟表匆忙的声响。”读到这里，我仿佛看见一个小女孩站在钢琴边，被母亲的琴声包裹。对儿子，她写道：“不去城市，不去乡村，/我的儿，去你自己的国度……”一个母亲在流亡中写下的，不只是思念，更是对故土血脉的倔强守护。

其次是对友人的爱。茨维塔耶娃与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等著名作家保持多年的书信往来。她在诗篇中塑造了她心目中多位诗人的形象，并在他们的创作中挖掘了他们与现实世界复杂而又痛苦的联系。侨居国外后，她继续写诗人这一主题。如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的死使她深受震撼，在为他们而作的诗中，她刻意组织了两人在冥界中的对话：“在俄罗斯——/指哪儿？——苏联有什么新闻？——在搞建设……”读这样的诗句，能感到她心底的困惑与悲凉。

再者是大自然的爱。作为一个抒情诗人，她崇

尚自由，热爱大自然，并把自己与大自然联系在一起。她写道：“火红的花楸果挂满枝头，/树叶飘零。/我降生。”短短几行，生命与季节融为一体。在《花园盛开，花园凋谢》中，她写道：“风吹来相遇，风吹去分手。/所有仪式中我只尊崇一种：/亲吻双手。”这种洒脱，让人羡慕。

最后来说说茨维塔耶娃对祖国的爱。茨维塔耶娃的祖国主题主要是在“莫斯科组诗”中展开的。她几乎不写现实中的祖国，而写理想中的祖国。“向你问好，长满黑麦的俄罗斯土地，/还有那俯身麦丛的俄罗斯农妇。”她的爱国主义激情由于侨居国外而显得越发突出。“哈利路亚的赞美声/流向黢黑的田野。/我亲吻你的胸口，/莫斯科的土地！”（《莫斯科诗抄》）这些诗句让我想起一句话：离开故乡的人，才真正拥有了故乡。

茨维塔耶娃的爱情诗，有一首是世界级别的，特别出名：“我想和你一起生活/在某个小镇，/共享无尽的黄昏/和绵绵不绝的钟声。/……此刻你若不爱我，我也不会在意。/……你会躺成我喜欢的姿势：慵懒，/淡然，冷漠。/一两回点燃火柴的/刺耳声。/你香烟的火苗自转弱……”这首诗里有一种极致的温柔，也有一种极致的孤独。

茨维塔耶娃的诗以爱情和生命为主题，感情深沉，富有悲剧内涵，但她的内心却充满了炽烈的爱。她爱这个世界，爱她的国家俄罗斯，爱艺术，爱诗，爱她周围的亲朋挚友。她在孤独中写诗，却在艺术上刻意求新，在音韵、节奏、意象和句法上都自成一格，别具一格。她的创作把日

常生活作为描写的对象，对当今的俄罗斯诗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茨维塔耶娃是俄国白银时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还被布罗茨基称为“20世纪的第一诗人”。读茨维塔耶娃的诗，就像领略着她在花园里的爱。为此，我写了一首诗：

读茨维塔耶娃

她说：我的火焰只为自己燃烧。

我从桥上走过，
手里没提灯笼。
海浪自己会来。

龙卷风到来的沙石，
扑打着玻璃窗。
我关紧窗，
继续读她的诗——

她的爱是一座花园，
长满荆棘。
花开了，刺也扎进去了。

月亮照在田野，
树自己长出影子。
我不需要玫瑰，
只需要那个在黑暗中，
也能发烫的声音。